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第六辑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法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的《矛盾论》研读

WEIWUBIANZHENGFADEMAODUNFAZE

王鲁玉·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第六辑编委会

主 编

李 静

副主编

钟正平

执行主编

魏金和 方建春 刘衍青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丁建海 马 旭 马振彪 王兴文 王安治

方显仓 王得盛 田凤俊 刘世巍 刘旭东

朱进国 伏振兴 郎 伟 虎西山 刘 媚

单 侠 金周宏 郑海洋 虎维尧 武淑莲

赵文霞 赵晓红 高广胜 郭亚平 高顺斌

梅 军 梁永锋 惠治鑫 蔺 勇

前 言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第六辑》编纂完成,将于2018年与读者见面,本辑有三部著作(论文集),分别为徐燕教授等人编著的《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手段》、王鲁玉副教授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法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的〈矛盾论〉研读》、刘衍青教授主编的《固原历史文化研究》(第五辑)。从数量来看,本辑比前几辑要少,但三部论著集中反映了宁夏师范学院近年来学科发展的重点和特色,值得推介,以飨读者。

宁夏师范学院于2016年入选宁夏回族自治区“一流学科”创建单位,教育学学科被确定立项为一流建设学科,按照西部一流学科(B类)标准进行建设。目前,教育学学科已形成了四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学”是其中之一,是为适应大数据下现代教育的发展需求,集合校内外科研力量而开辟的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徐燕教授等人发挥专业优势,撰写的《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手段》一书,既注重理论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突出师范生教育技术动手能力的培养,又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信息技术对现代教育之影响有科学的预判。本书的出版发行,将有益于推动宁夏师范学院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发展,引领学者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与意义。中国共产党历经近一个世纪,其间跌宕峰回,波澜壮阔,但贯穿全过程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毛泽东同志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于50年代的《矛盾论》是一篇享誉世界的哲

学名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经典文本。王鲁玉副教授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法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的〈矛盾论〉研读》,对毛泽东《矛盾论》的基本思想、逻辑展开和理论价值,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和探寻。刘衍青教授主编的《固原历史文化研究(第五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集体成果。本辑从政治军事、语言民俗、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反映了当代学者对丝路重镇固原历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史料挖掘、方法更新、地方文化交流等方面,体现出固原历史文化的研究正朝着深入、开放的方向发展。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第六辑》凝聚着作者(编者)与编辑同志辛苦耕耘的汗水,在学校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即将面世。我们真诚期待读者朋友的批评与指正,期待宁夏师范学院的教师借助这个平台,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第六辑》编委会

2017年12月

目 录

绪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文本——《矛盾论》 / 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 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界定 / 7

三、《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文本 / 14

四、关于《矛盾论》研究概况 / 17

第一章 《矛盾论》文本的历史流变 / 22

一、《矛盾论》文本概况 / 22

二、《矛盾论》修订的原因 / 24

三、《矛盾论》文本比较 / 30

第二章 《矛盾论》的基本哲学思想 / 49

一、序言(1—2段) / 49

二、两种宇宙观(3—8段) / 51

三、矛盾普遍性原理(9—30段) / 55

四、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31—55段) / 56

五、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56—75段) / 68

六、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76—102段) / 75

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103—110段) / 82

八、结论(第111段) / 83

第三章 《矛盾论》哲学思想的活水源头 / 85

一、源头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本 / 86

二、源头之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 / 96

三、源头之三：中国革命实践 / 103

四、理论中介：中国军事辩证法 / 108

第四章 《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展开 / 112

一、毛泽东对《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完善 / 112

二、邓小平对《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发展 / 119

三、江泽民对《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发展 / 123

四、胡锦涛对《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发展 / 125

五、习近平对《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发展 / 131

六、国际社会对《矛盾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展开 / 135

第五章 与《矛盾论》相关的未竞争鸣 / 142

一、《矛盾论》本身存在的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观点 / 142

二、对《矛盾论》的各种质疑 / 156

三、《矛盾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冲突吗 / 158

结语：《矛盾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永不磨灭 / 166

附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矛盾思维方式的建构研究 / 170

参考文献 / 216

绪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文本——《矛盾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许多理论著作毫无异议地具有世界性影响。在其诸多理论著作中,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篇享誉全世界的哲学名篇,在国内外有着数量巨大的拥趸。自这两篇哲学著作成书以来,便成为毛泽东在海内外出版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直至今日,《实践论》和《矛盾论》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2007年,英国Verso以*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为书名重新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英文版,并由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撰写序言^①。

同《实践论》一样,《矛盾论》原稿是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哲学讲稿的一部分,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同《实践论》不太一样的是,《矛盾论》的创作和成书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最终完成,足见作者对该文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亲自牵头,对其做了大幅删减和修订,于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并正式命名为《矛盾论》。据此可以认为,1952年4月1日之后,《矛盾论》才有定本。《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有

^① 康慨:《齐泽克注解毛泽东革命经典》,2007年4月4日《中华读书报》。

着浓厚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尽管《矛盾论》是在谈哲学问题,其抽象程度远远高于《实践论》,但它并不是作者在书斋中沉思的产物,而是出自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中,出自作者日常革命、生活的实践中,是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产物。作者在《矛盾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作了独到的阐发,得出了简洁而不简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结论:“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①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推进,我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高潮。而1998年李瑞环在其主持出版的《中国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序言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命题的重提对该研究高潮起到了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之所以说“重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作为口号和研究方向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提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36-337页。

出,而且还收到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据现存有效资料看,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1日《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①。不久之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②如果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苛刻界限,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是在更高的理论立足点和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事实上,此后乃至当今的很多理论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界定大多都是援引于毛泽东的这一表述。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样,当一种理论被作为“问题”明确提出来时,往往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实践出现重大转折、这个时代的社会价值出现重大调整的时候。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时的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得出如下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为合理地解决中国社会实践(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世界历史性”进程之序差^③的合法性而提出的

中国社会实践的“世界历史性”进程之序差主要表现在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发展现状之间。这种序差在20世纪30、40年代表现得更为复杂。就社会

①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③ 任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现代性路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160周年后的新解读》,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五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制度而言,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由苏联开启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而中国却才刚刚开启封建主义的瓦解时期,而且又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导致了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敌,内无以安民;就生产力水平而言,世界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的成果和对外殖民掠夺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而中国却一直处于因旧权力中心丧失而导致的内乱之中,工业化建设根本无从谈起。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当时中国历史发展所处的客观阶段之间的强大反差。所以,当时的中国实践(主要是社会革命)所要解决的历史性任务主要是反对封建主义以取得中国民众的自由,反对帝国主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官僚资本主义)以取得中国国家的富强,建立社会主义以彻底取得民众的自由、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对于这一任务的认识和解决方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并对中国的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尤以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为代表。前者是保守主义的革命论,后者是冒险主义的革命论。两者错误的共同根源在于不注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只是教条主义的对待马恩经典论述和共产国际的决策。而这种教条主义的最重要根源就在于忽视了中国社会实践的“世界历史性”进程之序差,没有认清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曲折历程:就国际而言,有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苏南事件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尤其是苏东剧变;就国内而言,有50年代的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以及在70年代末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受这些事件冲击,背后隐藏的问题日益显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何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何在?其实这些问题的实质依然是中国社会实践(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历史性”进程之序差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其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主要是我们已经选择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内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

之间的强大反差。因此,我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以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是在阐释这一主题。由以上的论述可知,虽然两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的具体时代背景各异,但面临问题的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为合理地解决中国社会实践(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世界历史性”进程之序差的合法性而提出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为严肃准确地总结中国社会实践(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

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前一阶段(1927—1935年)的工作进行总结。按毛泽东所讲的,中共在那一时期经历了两次重大失败:其一是大革命的失败,其二是反围剿的失败。而导致这些重大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食洋不化”,一是“食古不化”,主要是前者。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不关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只是一味地为自己的行为从国外或远古寻找依据,完全忽视了自己国家正在变化的具体实际。其中尤以生搬硬套马列教条为最。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如何对待中国革命的经验、如何本真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而“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

的具体环境。”^①同 20 世纪 30、40 年代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53—1978 年)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其二是如何对中国自 1978 年后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的提升。前者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后者主要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在理论上的抽象,同时还是对由于社会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价值和社会道德紊乱进行合理地调整。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为严肃地总结中国社会实践(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学术研究本着社会责任之自觉而提出的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修齐治平”“安邦治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针对中国革命惨痛的失败教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积极的社会责任之自觉。当时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如艾思奇、茅盾、张仲实、何思敬、周扬、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吴玉章等。他们还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以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并收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样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也涌现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转型以及西方哲学的大量引进等大大拓展了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的学术研究先后进行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人道主义大讨论”“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并且还开展了自 2001 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年度研讨会等等,无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大背景下进行的社会责任之自觉的活动。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之自觉。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1 版,第 533—534 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与路径界定的表述各异,但有一种大致相同的基调,即都将理论焦点锁定在“两化两结合”上。“两化”是“具体化、民族化”;“两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发展着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经典”界定的源头是艾思奇和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和在《〈中国共产党〉发刊词》中的表述。这种表述以其通俗性和权威性向来被奉为“经典”,一直未被质疑,而实际上却是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推敲的。因为无论是“应用”还是“结合”都只是在外在形式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中国化,尽管可能也获得了所谓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曾经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①“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②就是说,中国化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③。

学者在重述经典界定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出了自家的“良方”,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新实学界定说

以周树智为代表。他认为:“时至今日中国哲学改革的一种方向和出路就是哲学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相结合、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841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851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533-534页。

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相结合,建设当代中国的新实学。”^①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髓、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秀实学传统和当代中国人务实求实的建设实践在今天达到了高度一致。能够看出他意在新实学的名义下完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整合的努力,试图在现代实践的高度进一步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想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着中国哲学讲,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毕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哲学范式。先撇开这两种哲学范式之间通约的可能性不谈,那么被招安到“实学”(尽管论者很勉强地加了个“新”字)名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具有其本真性可言?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是否仅仅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往中国传统哲学这个旧瓶里一装即可了事?这恐怕还有许多商讨的空间。

(二) 诠释学界定说

以皮家胜为代表。他先后发表数篇文章阐发自己的这一研究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可以作为一个命题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②。前者是以判明真假为指向,要求的是对自身的证明和认同,表达的是一种既定的缺乏生命力的存在;而后者则是沿着问题所指示的方向作出应答(肯定的或否定的)。问题开启的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未定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遇到的必然是理解问题,其次是解释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却要受制于诠释主体自身的实际需要、时代背景及其无可选择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在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携带着我们自己早已形成

① 周树志:《建设当代的新实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载《理论学刊》2004年8月第8期,总第126期。

② 皮家胜:《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维度》,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07年第2期。

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进行交融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实践应用过程。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当然地被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与对它作出理解的理解者的视野之间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视野融合’”,是理解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的一场辩证对话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界定的优点有两个:其一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特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其二是将诠释主体与被诠释者平等而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视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融合过程。但是忽视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开出的奇葩,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西方文化最大差别是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差距,如果过分强调视野的平等交融,会不会导致压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批判的空间?

(三)现代化界定说

持这种界定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有袁吉富、何萍、李维武等。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应用与发展其实都是中国现代化这一大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且始终都与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相联系,也是世界化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认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既要具有“中国视野”,也要具有“世界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除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外,还应该考察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界思潮的关系等多个层面。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还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更应该是中国社会实践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他们讲:“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和时代性,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提升,它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的

精华。”^①这种界定的优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紧紧地锁定在时代发展的脉搏上,抓住了关键,放宽了视野。但是就现有研究成果看,大多都是有方案性却无操作性,往往流于将问题大而化之,缺乏深入细致的问题研究。

(四) 范式转换界定

以汪信砚、董德刚、庄友刚为代表。这是一个目前非常新颖且渐成气候的研究方向,而且还曾被确定为2007年在苏州召开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的核心论题。汪信砚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教科书范式”(20世纪80年代之前)、“教科书改革范式”(20世纪80—90年代)、“后教科书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并认为目前的研究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且“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成为衡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标准”^②。董德刚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以“新”解“马”的范式,即“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③。庄友刚则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中的基础和原则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应注意分清其中的层次性。具体而言,就是要分清所进行的范式转换研究究竟是属于学科间的还是学科内的抑或是理论派别内部的,做到对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的科学定位,以确保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化研究确属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而非“越界”的研究。富有创新性是这种界定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刚刚起步,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汪信砚虽然提出了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但并未能真正厘清前三种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之间究竟

①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② 汪信砚:《倡导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

③ 董德刚:《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以“新”解“马”范式》,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

属于什么关系,是种属关系还是承继关系?董德刚提法的最大问题存在于对“新”的界定上。因为“新”本身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拿它去界定一个尚有分歧的概念是否恰当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由此而看,庄友刚提出在范式研究中应注意其原则问题确属空穴来风,是非常有价值的。

(五)文化界定说

以陈树林、周和风、马俊峰、张奎良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19世纪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是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并指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作为西方的先进文化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①。从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界定,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等的转变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形式方面的,更多的应是实质方面的。应当承认这种看法抓住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个切入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颇具启发性意义的思路。我基本上赞同这种解说,但是学术研究中开风气较易,深度挖掘却是非常有难度的。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真正沿着这条路径条分缕析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六)思维方式创新界定说

这是本文的观点。一般来讲,当一种理论成为问题被大家广泛加以阐释并形成论争之时,往往就是对其基本内涵界定不够清楚之时。而要想比较清楚地界定理论内涵并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争论,重要的原则应该是首先要搞清楚对其内涵进行界定的层次问题。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言,学界之所以有这么多各异的界定,除了当前哲学研究的繁荣外,更重要的

^① 张奎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起点》,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